

土地革命初期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探索及当代价值

□ 闻君宝 李江涛

[内容提要]在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全党开启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实践。在主要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革命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实践上逐渐自觉地开始把取得革命胜利的战略基地放在农村,将进行土地革命、游击战争、发展红军作为实现胜利的根本力量,实现了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更从理论上论证和思考了走农村革命新道路的必要和可能,集中探索了争取群众、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革命形式,实际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和以农村苏维埃割据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等重要思想。这一探索历程,不仅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今天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革命道路;实践探索;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091(2021)02-0159-06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面对大革命失败后严峻的革命形势,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继续高擎马克思主义旗帜,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及时总结和反思过去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制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开启了党独立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实际特点,开始自觉地将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积极领导农村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实际形成了一套创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理论及斗争经验,在实践上已经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成为全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面光辉旗帜。

一、确定了找着新道路的实践方向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在实践上开启了“找着新的道路”的伟大探索。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党坚决执行领导一切群众斗争进到武装暴动,以达到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获得大范围胜利的革命任务和策略方针。当时,毛泽东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先后被派遣到全国各地进行组织和领导武装起义的工作。以南昌起义为起始,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党就先后独立领导了秋收起

【收稿日期】2020-07-28

【作者单位】东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吉林 132012

【作者简介】闻君宝(1986-)男,中共党员,法学博士,东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

义、广州起义等大小上百次武装斗争和罢工运动,各地的工农革命此起彼伏。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党对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主要还是以领导进行城市武装斗争,其大多数的武装起义都因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等条件影响而先后遭遇挫折。这样,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问题,就成为全党亟须解决和回答的一项重要课题。

当时,在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党已经开始认识和思考要探索一条不同于苏俄式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问题。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就曾提出过“上山”主张。“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党中央在发出的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文件中也认为,如农民武装在不能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或是不能做到平时分散进行秘密训练、战时随时集中的情况下,则可“上山”。随后,在党中央给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的信中,又将“上山”主张用于指导军队斗争,提议叶贺军队如起义失败后在“不得已时图向湘南发展,最后失败始上山”^[2]。而对于“上山”思想,在实践上最早开始将其从理论变为现实的当属毛泽东。秋收起义中,毛泽东根据攻打长沙失利后的实际情况,及时作出了转兵井冈山的重要战略决策,带领起义部队转入广大的农村区域继续战斗,在实践上开始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乡村。毛泽东带领工农红军经过艰苦斗争,先后帮助群众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等苏维埃革命政权,实际控制了宁冈全县,遂川的西北部和永新、茶陵等一部分地区,成功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的崭新局面。在井冈山革命实践的影响下,全国大都数起义部队陆续转入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区域继续战斗。

随着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农民游击战争的发展,促使了党中央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进一步关注。党中央根据农村斗争的形势和实践特点,在给湖南、湖北省委的信中首次提出了“割据”思想,强调要集中力量割据某县或数县。随后,党中央逐步调整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斗争策略,深化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对于推动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的重要意义。当时,作为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认为,应首先实现从游击战争到农民暴动或斗

争的革命发展路线。在这里,这条道路和发展路线是适应于目前革命没有夺取“首都”而一击而中的形势需要的。在指导农民的武装斗争中,党中央进一步将发展红军与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要求“朱毛”红军能汇聚一处,以“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3]。随后,又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思想,认为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应是在湘赣边境或湘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这样,在农村中应普遍地发展农民群众切身的斗争,如抗税、抗租、抗捐、抗粮、抗债、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与土地、焚毁田契租约债券、夺取民团团防及驻军的武装、实行群众的游击战争等,进而达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目的。

此时,经过全党的不懈努力,不仅逐渐突破了过去只将农民斗争作为一个临时辅助策略的认识,开始将领导农村游击战争、实现农村武装割据作为党的一项重要战略计划和革命方针,并且围绕这一方针初步探索了关于农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等具体革命策略,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一,明确了农村土地革命的路线。1927年11月,党中央在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明确了以生产范围(耕地亩数之多寡)及水田旱田、田地肥瘠、每年收获次数等作为分辨农民类别的标准,将农民阶级划分为佃农、自耕农、半佃农三种。据此,确定了主要依靠苦力和雇农,同时尽力吸引乡村中的中农,以反对地主、商贾、一部分富农、重利盘剥者、土豪乡绅等剥削者的革命路线。

第二,制定了土地分配的基本政策。根据各地土地革命的实际需要,党中央明确了应实行没收地主及所谓公产的祠堂庙宇等土地,取消一切的地主所有权,而实行耕地农有的土地政策,强调将没收后的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其主要标准为土地的肥瘠和人口的多寡。

第三,说明了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八七会议后,党中央先后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提出了“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4]的任务。

1928年3月10日,党中央又下发第三十七号通告,用较大篇幅阐述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实际明确了乡村、区、县、省等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常委会的组织构成与基本责任等。

第四,探索了创建和发展红军的基本原则。1927年9月,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不仅率先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并在带领起义部队转战井冈山途中又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写下了浓重墨彩的一笔。随着红军战争的发展,党中央先后下发《中共中央给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的信》、《关于军运工作给许权中等的信》、《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等文件,初步探讨了军队建设和发展的基本原则问题,主要包括注意从成分上改造军队、军队的组织办法、军队的建设任务、军队与兵委的关系、以及训练赤卫队和做好军阀部队中兵士群众的工作等。

二、探索了争取群众、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革命形式

经过近一年的斗争实践,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党还未来得及系统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下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也还未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思考。这就需要及时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面、系统、客观的梳理和分析革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弄清革命发展道路的各项问题,正确制定党在新时期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1928年6月,中共六大总结了农村革命中孕育出的斗争经验,制定了争取群众的革命总路线,肯定了农村武装割据斗争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将主要精力逐渐转移到领导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建立红军和农村苏维埃政权等方向上来,形成了用不断巩固和发展农村苏维埃割据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探索了一系列适合农村武装斗争实际的革命形式。

以在争取群众的斗争中来准备武装革命为基础。中共六大正式明确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强调党的工作方向,必须坚决的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转变到加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的方向来。要通过实际深入群众做群众工作,宣传武装群众准备革命,在领导群

众进行实际的经济、政治斗争中创造新的革命高潮,来达到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实现了从不断执行武装暴动政策到在群众中准备武装斗争的重要转变。具体来说,要实际团结和深入工农群众,改变过去的“不顾群众”和“强制命令群众”的错误,杜绝过去那种不顾群众和敌人力量的少数人的军事冒险;要加强对群众的革命宣传,不断提升群众的革命意识和政治觉悟,使他们自己积极的赞助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这是做好准备群众工作的重要一环;同时,要在领导群众进行实际斗争的过程中锻炼和争取群众,学会从指导群众的生产生活斗争入手,以调动极广大的工农群众到中国共产党的方面来。

以解决农民问题的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中共六大指出,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日益变坏,而资产阶级地主豪绅的反革命又因得到了暂时的胜利而加剧了对乡村农民的直接压迫和剥削,使得“乡村中的阶级矛盾越加利害,农民运动进到更深入更高的要求与更剧烈的斗争”^[5]。为要使农民摆脱地主高利贷的束缚、脱离官僚封建制度豪绅的压迫,就要消灭农村中地主高利贷,彻底扫荡旧时的官僚豪绅政权机关,才能最终实现农民的解放。因此,要将目光转移到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运动中,将解决农民问题的土地革命作为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土地革命对于发展农民斗争、创立苏维埃区域、扩大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等作用,这就在实践上初步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农村发展方向。

以发动农民游击战争和创建红军为组织方式。中共六大认为,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让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尽量发展,使其和游击战争等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最终向创建有组织的红军队伍的方向发展。具体来说:一是要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集中指导,巩固并扩大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团聚广大农民群众并领导其斗争,以改变过去农民群众斗争的散漫状态与缺乏组织性。二是要保证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密切的联系,巩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思想上与组织上的领导。三是应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应在党的领导下、不失时机地使它继续深入和扩大,以引导农民战争到有组织的斗争、再到自觉的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

土地革命的斗争方向上来。四是要组织工农红军。要在现时的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内进一步组织和建立红军,使红军的发展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重要动力。

以建立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为政治保证。中共六大强调,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应“说明不仅自卫,且要进攻,乃是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唯一担保”^[6]。这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苏维埃以武力直接进攻邻近的反动区域,另一种则是帮助邻近区域发动群众暴动。但无论哪种方式,都应注意红军的进攻应当与邻近区域的武装暴动相呼应,而准备和组织区内的政权也要与红军的进攻相策应。在这里,苏维埃政权的进攻,体现着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废除过去的反动政权,在农村建立农民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机关。通过引进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来彻底扫除过去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权力,使农民从一切资本主义前期落后关系之下得到解放,使中国农村半无产阶级以及苦力雇农力量造成转变的一个基础,以保证农村革命中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本身就是一种无产阶级政权的准备状态和过渡形态。它是农村工人与农村中半无产阶级分子一同在有组织的城市工人领导之下,去与乡村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斗争,努力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途的政治保证,因而是可以成为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出发点。这样,随着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的创建和发展,不仅为土地革命和农村游击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保证,同时还实际承担着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重任。

此时,尽管说党并未明确提出过“乡村中心”、“农村中心”等革命方针或口号,在革命策略的转变上也仍然受到共产国际“城市中心”思想的影响,但是此时党关于农村革命斗争形式和政策的理论认识已经在党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为党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彻底地结束“城市中心”的策略路线,形成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 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中共六大后,各地党组织在实践中对六大

精神进行了积极的贯彻和发展,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精神和革命勇气。其中,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7]。

在井冈山一年零三个月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就已经开始从革命战略发展的视角来认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问题。当时,针对红四军党和军队内存在的革命悲观情绪和对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怀疑问题,先后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从理论上初步提出和思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阐释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明确指出了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8]。

当中共六大决议传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毛泽东在第一时间向根据地党和红军传达了各项决议。1929年1月柏露会议上,毛泽东按照中共六大关于发展红军和以红军战争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和游击区的要求,决定将红四军、红五军混合改编一次,以统一指挥和便于军事训练,同时制定了“攻势的防御”战略,以内线和外线相互配合的办法来打破敌军的“会剿”。会后,毛泽东、朱德等人率红四军主力主动跳到外线作战,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转战途中,毛泽东带领红四军一边行军作战,帮助沿途各地建立党组织和秘密工会、农会,广泛动员群众进行革命;一边利用作战间隙和有利条件,继续组织红四军及各地方党组织学习和宣传中共六大决议的精神;同时,还结合中共六大精神在各地进行调查研究,领导当地党组织制定各项具体的革命政策,实际推动了中共六大精神和农村革命实际的结合。

在转战赣南、闽西时期,毛泽东先后撰写《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经毛泽东修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

进一步从中国革命发展大视野来思考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义。此时,毛泽东在实践上正式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设想和筹划在“赣南闽西二十余县”范围内实行“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的战略计划。他批评了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农民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强调在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革命本身的。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无疑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9],实际明确了以乡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思想。

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到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开辟、再到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实现了革命重心从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开始把取得革命胜利的战略基地放在农村,实际改变了中共六大关于只将农村革命根据地作为实现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的策略部署;更在思想上,逐渐突破了共产国际固有的“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框架,从理论上论证了农村革命新道路的必要和可能,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实际相结合,在群众的斗争中作实际调查、了解中国情况,以实现从斗争中不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方向;同时,还围绕这条革命新道路进一步探索了关于建党、建军、建立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路线方针,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最终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明确了党建的思想路线和基本原则。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同中国农村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把党的建设提高到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突出强调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实际提出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规定了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内容、目标和方式,初步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以思想建党为主要内容的党建理论。

第二,确定了红军建设和发展的思想原则。毛泽东强调了红军战争的重要性,认为“所谓

割据,必须是武装的”^[10]。在实际的斗争中,形成了一条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武装斗争路线。实际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人民军队的性质和任务、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军队内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民主主义制度等一整套关于如何建立军队的思想原则,并总结了以“十六字诀”为基础的一整套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战略战术,回答了土地革命战争环境中如何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第三,采用和发展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在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已经将苏维埃政权建设与进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紧密地结合起来,对苏维埃政府的机构、政权建设原则、党政关系及其分工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说明,并强调要发挥苏维埃政权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改善民生和发展生产等方面的作用,初步解决了在进行战争的特殊条件下如何建设政权的问题。

第四,制定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毛泽东认为,土地革命的路线应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削富农与消灭地主,对于中小商人应极力保护、纪律森严、毫无侵犯。在具体的实践中,应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实行以乡为单位,按人口标准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并结合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同时,土地分配给农民后,应肯定土地所有权归农民私有的土地制度,已分定的田由得田人负责管理并由他私有,如租借买卖等应由他自己自主。

总的来说,土地革命初期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革命新道路的伟大实践,不仅对于推动土地革命发展新局面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也对今天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启示意义。

第一,要有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自觉。历史已经证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11]可以说,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没有固定模式可言。对于今天来说,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要继续结合本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持续探索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事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第二,要有坚定走中国道路的自信。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中国道路实为不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因为这是关系着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12]。长期的历史实践已经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对于今天来说,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着无比广阔的舞台、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应该有信心坚持下去,努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三,要不断弘扬走中国道路的伟大精神。党领导中国人民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在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道路之中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而这些伟大精神又成为滋养中国道路的重要力量源泉。对于今天来说,我们要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就需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的支持。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要有开拓创新的勇气,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要“把开拓创作作为一种常态,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

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又从实践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敢破敢立、敢闯敢试”^[13],在持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1.
-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57.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811.
-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08.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24.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69.
-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58-959.
-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0.
-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8.
-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99.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
- [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9.